

我们的革命

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

[美] 伯尼·桑德斯 / 著

钟舒婷 周紫君 / 译

— OUR —
REVOLUTION

Bernie Sanders

我们的革命

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

[美] 伯尼·桑德斯 / 著

钟舒婷 周紫君 / 译

— OUR —
REVOLUTION

Bernie Sander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们的革命 / (美) 伯尼 · 桑德斯
(Bernard Sanders) 著; 钟舒婷, 周紫君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Our Revolution
ISBN 978-7-5594-2147-0

I . ①我… II . ①伯… ②钟… ③周… III . ①政治 -
研究 - 美国 IV .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753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8-201

OUR REVOLUTION
Text Copyright ©2016 by Bernard Sander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我们的革命
作 者	伯尼 · 桑德斯 (Bernard Sanders)
译 者	钟舒婷 周紫君
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147-0
定 价	68.00 元

前 言

2015年4月我的团队开始竞选总统，那时，政界和媒体都不把我们当回事，认为我们是支边缘化的竞选团队。毕竟我只是个小州的议员，没什么知名度。我们没有竞选经费，没有政治组织，我们要接受整个民主党的挑战。而且与我们竞争的，是美国政界最有权势的团队。克林顿团队已为比尔·克林顿赢得了两次大选，希拉里·克林顿也差一点儿在2008年的大选中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2016年7月，当我们的竞选接近尾声时，事实证明业界人士都大错特错了。我们创造了历史，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竞选团队，我们的竞选将深刻地改变整个美国。

在初选和预选中，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1300多万选票，赢得了22个州的选举，其中在一些州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民主党党代会中，我们获得了1846位代表的支持，占总人数的46%。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几乎在每个州都获得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他们是美国的未来。无论是欧裔、非裔、拉美裔、亚裔的青年，还是美国土生土长的青年，他们都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支持。我们的目标，就是为美国的未来而设的。

2016年4月2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Institute of Politics)的民意调查，“哈佛大学研究的数据表明，桑德斯的竞选不仅在民主党初选中出人意料，他同时也改变了年轻人对政治的思考方式。”民意调查主任约翰·戴拉说道：“他不是将一个政党带往左方，他是将一代人带往左方。”“不论输赢，桑德斯都影响着美国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思考政治的方式。”

曾经人们对政治漠然视之时，选民投票率极低，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放弃投票。而我们的竞选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他们遍布全国每一个州，积极地支持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竞选动员了最大规模的民众，共有1400多万人出席了我们的集会。

由于在许多州都获得了胜利，我们至少争取了5个民主党席位。之后我们的团队将为一些优秀候选人提供支持，鼓励他们竞选相应的职位，不论是教委会，还是美国国会，他们当中多数人都会获胜。这无疑是为美国政坛注入新的血液，新的能量。

我们的经验也表明，没有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资金支持，也能成功动员全国的

民众，让竞选极具竞争力，这一点可以为美国的政坛带来永久性的变革。令人自豪的是，我们是唯一一支没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的竞选团队。我们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了约 800 万的资金支持，平均每笔捐助金额为 27 美元，这些捐助来源于 250 万美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中低收入者。

在竞选中，我们将政府深埋已久的问题重新搬出。我们让大家关注美国收入差距悬殊、不平等的问题，也强调了应拆分将美国经济引入崩塌边缘的大型银行，也暴露了美国当前糟透的贸易政策、已破裂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群众承担不起高昂的医疗和高等教育费用等问题。我们也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危机，解决全方位移民改革的迫切问题，并努力制定“重外交轻战争”的对外政策，等等。

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这表明我们的理念符合民众的主流意愿，这也表明数百万的美国民众都支持更为大胆、进步的提案，敢于挑战富人阶级，建立起真正为所有民众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仅服务于主要的竞选捐助方。

民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也转变了民主党的态度，希拉里国务卿不得不将几个领域的提案与我们相靠拢。竞选之初，她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基石输油管线项目（Keystone Pipeline）的支持者，但后来她对两者皆持反对态度。经过两大阵营间的多次协商，希拉里国务卿在高等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立场都较之前更为进步，更加贴近我们所倡导的理念。

我们的竞选深刻影响了民主党的竞选议题，本届民主党提出的议题是有史以来最为进步的。虽然我们是少数派，但我们的支持者深刻影响了民主党的主张。以下是 2016 年民主党支持的议题：

- 全国最低时薪 15 美元，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新增数百万就业岗位以支持基础设施重建工作；
- 将“大而不倒”的银行进行拆分，制定 21 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①；
- 堵住跨国企业海外避税的漏洞；
- 通过征收二氧化碳污染排放税来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 主要刑事司法改革，包括废除死刑、关闭私立监狱；
- 全面移民改革；
- 全面保护美国本土民众权利。

^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

在为期 15 周的竞选过程中，我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这里我想再次重申一遍：竞选远不仅为了选举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竞选是美国的一场革新，它表明真正的变革从不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才会带来变革。当数百万的普通民众并肩为正义而战，变革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工会运动、女性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环境运动、正义运动的意义所在。

政治革命的意义也在于此。

竞选结束后，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比竞选之初更有信心了。怎么能没有信心呢？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与数千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进行交流，他们都有决心变革我们的国家。他们当中有雇农、环保人士、同性恋活动人士和学生。他们和我都清楚要想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不给煽动者任何机会以人种、性别、性取向或出身来分裂我们的国家。

在寒冷的一天，我的员工看到缅因州的民众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为的是在预选中投出自己的一票。在亚利桑那州，人们需要排五个小时的队投票，但他们还是一直坚持排着队投出自己的一票。在全国各地，人们都在努力为我们迫切需要的民主而战，都在全力阻挡我们的国家偏向寡头政治。

在纽约市，我走过威瑞森公司门口的纠察线，看到工人们罢工抵制公司削减福利、外包工作，他们向大企业的贪婪宣战。他们是值得自豪的联盟，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

在华盛顿特区，我加入了低收入者的游行，他们告诉世界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让他们饱受饥饿，无法生活，国家需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计。他们的声音和努力回荡在美国各个角落。

这本书记载了我的团队历史性的竞选历程，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展望了美国的未来。它呈现了一个基于经济、社会、种族以及环境公正的全新的美国。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条路我们必须走，这场仗我们必须赢。

努力仍在继续。

▲第一部分 竞选总统

- 第一章 竞选理念的产生 · 2
- 第二章 在佛蒙特州的政治生涯 · 15
- 第三章 考虑竞选 · 31
- 第四章 如何进行总统竞选 · 57
- 第五章 竞选开始 · 80
- 第六章 竞选征程 · 89

▲第二部分 建立全新的美国：怎样变革我们的国家

- 第一章 挑战寡头政治 · 126
- 第二章 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 · 139
- 第三章 终结经济操纵 · 147
- 第四章 全民医保 · 220
- 第五章 让高等教育费用合理化 · 233
- 第六章 对抗气候变化 · 244
- 第七章 真正的刑事司法改革 · 258
- 第八章 移民政策改革，刻不容缓 · 266
- 第九章 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 276
- 第十章 公司制媒体及其对民主的威胁 · 288

结 论 · 307

致 谢 · 309

第一部分

竞选总统

第一章 竞选理念的产生

布鲁克林

我自小住在仅有三间半屋子的出租公寓里，多年来，我和我的哥哥拉里一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2016年的纽约州初选中，为了告诉纽约民众我自幼成长在布鲁克林区，我们专门在我居住的东二十六街上举行了集会。我离开这里已经 56 年了，这一次我有机会重访自己 18 岁前住的公寓。不知怎么的，我感觉这所公寓好像萎缩了。它真是太小了，餐厅更是窄小，很难想象当初我们一家四口人是怎样在这么狭小的餐厅享用晚餐。整个房子比我印象中的更为昏暗、脏乱，而且一层住了太多住户。

我还记得在小时候我们住在布鲁克林区弗拉特布什社区（Flatbush）国王公路的公寓房里，有一天我站在公寓房外的人行道上，街上正进行着阅兵仪式——标志着二战的结束。那个时候我四岁。

那场战争，希特勒和大屠杀深深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方向。我仍记得我父亲一家在波兰的照片——他们死于纳粹之手。我还记得一天半夜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此前我们从未半夜接到过任何电话，我父亲得知他的一个表亲幸存下来的好消息，他现在被安置在了难民营。我还记得当我在一本书里看到犹太人被屠杀的照片时，我流下了眼泪。我还记得看到社区的人们在胳膊上文着文



妈妈、拉里和我，我是家里年龄最小的。（作者收集）

身——集中营幸存者。我还记得 1948 年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时，整个社区的人们有多么兴奋。

毫无疑问，身为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了家人的离去——其中包括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在德国大选中一个疯子上台当政；那场战争中 5000 万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杀戮，这一切对我此后的人生思考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的哥哥拉里比我大 6 岁，他将我带上了从政之路，还告诉了我许多道理。他在我的人生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永远感激他的关爱、忠告和智慧。50 年来，他与他的家人一直住在英国的牛津，从事着社会服务工作。10 年前，他被选入英国牛津郡议会的绿党^①候选人，任期结束后再次当选。如今他正在为维护一个强大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而积极努力。

我的母亲在拉里很小的时候便教会了他阅读，他这一生读了无数的书。拉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也教会了我读书。我们经常周六一大早躺在床上边吃零食边看漫画书。我小的时候，拉里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有时作为哥哥，他也把我折磨得够呛，因为他非常聪明，我不会的问题他总是能成功找到答案，而且他还故意让我知道。

当哥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他想



我和哥哥拉里（作者收集）



拉里和我在民主党大会上（简·欧米拉·桑德斯拍摄）

^① 绿党 (Green Party) 是一个以绿色政治为诉求的国际政党。绿色政治有三个基本目标：和平主义、社会公义（许多绿党尤其强调原住民的权利）和环境保护。绿党支持者认为实现绿色政治可以让世界更健康，而他们往往为建立生态保护区付诸实际行动，反对建立在对生态破坏上的经济发展策略。

出去和同学聚聚，还不得不照看着弟弟，不得已带着个小拖油瓶。这可不好玩儿。如果周六我父母不在家，拉里还给我做午餐，他的烹饪技术棒极了。他做的番茄酱意大利面和 My-T-Fine 巧克力布丁是绝顶美味。

我父母不太喜欢读书，家里基本上没什么书。我们从本地的图书馆借了些书，是拉里最先把书带到家里，放在书架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是拉里让我知道这些书讲的是什么。他是个好老师，他开阔了我的视野。

虽然我父母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但他们和整个犹太社区的人们一样，大选时都投给了民主党。是拉里将政治带入了我们家，那时他还是一名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他加入了民主党青年组织，并于 1956 年参与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竞选活动。

我很荣幸拉里、他的妻子詹内特、儿子雅各布都参与了我的竞选活动，我更有幸看到拉里作为海外民主党代表，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饱含泪水地将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我。

我家“穷”吗？绝不。我们像很多经济学家总说的有“可支配收入”吗？绝对没有。

我父亲是凯斯通华内仕涂料公司的推销员。他 17 岁时身无分文从波兰来到美国，一直以来他都工作赚钱养活妻子多萝西和两个儿子，钱虽够花，但并没有富余。

钱（确切地说，是缺钱）一直都是我家争论的焦点。我父母一天到晚争执不休，这种无尽的争执让人难过、痛苦，它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永远不会忘记。

“伯纳德，去外面买点日用品。我们需要的都在这个单子上了。”妈妈对我说。我乖乖地出去买东西，但走错了商店，我去了离家里几个街区远的商店，而不是诺兰得大街上的沃德保杂货店，我去的店卖的东西更贵些。回来时，妈妈知道我去错了店，冲我大吼了一顿，吓得我够呛。钱来之不易，绝不能浪费。

我 13 岁的时候，想要个皮夹克，当时流行这个。人人都有一件，而且我早就厌倦了穿我哥哥的旧衣服。“那好吧，”妈妈说，“给你买件皮夹克。”这次购物经历简直是灾难。这可能就是我至今还讨厌购物的原因吧，如果在一家百货商店逛半个小时以上，我就想着逃走了，不信可以问我妻子。

那天妈妈带着我去了至少 12 家店，就为了找到价格最低的皮夹克。我们首先去了国王高速路购物区的几家店，然后又坐地铁去了布鲁克林市中心和曼哈顿的大商场。纽约所有的皮夹克我几乎都试过了。

结果怎样呢？我们买了最初在国王高速路购物区某家店试的皮夹克。今天想起来还挺有趣的，但当时可一点都不好玩。

家庭收入决定了棒球手套的质量、运动鞋品牌以及家里开什么车。它也决定了你

是住在出租公寓（大多数朋友都住在出租公寓里）还是私人住宅中。我长大后才知道在很多人看来，街道两旁的一排排房子根本算不上私人住宅。其实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出租公寓和私人住宅的划分是非常明确的。住在公寓的是工人阶层，而住在私宅的是中产阶层。这是我印象中阶级划分的表现之一。

小时候我经常在街上和校园里玩耍。街道就是我们的乐园，每次出来都带个斯伯丁皮球。和今天不同，那时没有大人管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自己组织比赛。

一玩就是好长时间。我们在街上玩捉迷藏、吊球、曲棍球、触身式橄榄球，有车经过的话就当是暂停，球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就算犯规。我们还比赛往下水井盖里扔石子。如果扔进了中间的洞里，就可以赢回 10 个石子。

“我们一起玩什么游戏？……嘿，这主意不错，咱们开始玩吧。”

“可以借一下你的棒球手套吗？……谁负责带球棒和球？……他安全进垒了还是出局了？……出界了还是在界内？”

我们打篮球时大家没人纠结谁和谁一队，因为谁打得最好，谁紧跟其次，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是按实力均分组队的。

如果打三人篮球，输的队伍就先站在旁边观看，下支队伍和胜者继续较量。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

所有的规则都十分奏效。

现在想来，我们当初算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小团体了，我就是在这个小团体中懂得如何与人合作的，我永生难忘。

另外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布鲁克林道奇队与我们街头孩童以及整个社区的互动。长大后我被问到支持哪只棒球队。开什么玩笑？在我眼里只有布鲁克林道奇队一支球队，而且他们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

吉尔·霍奇斯是一垒，杰基·罗宾逊或朱尼奥·吉利姆打二垒，皮埃尔·基恩（我最喜欢的球员）担任游击手，比利·考克斯打三垒，赫尔曼斯基在左外野，杜克在中间，



父亲、哥哥和我（作者收集）

卡尔·富里洛在右外野，罗伊·坎帕内拉先发。投球区土墩有布雷切·罗伊、唐·纽康伯、卡尔·艾斯克尼、强尼·博德瑞斯、克莱姆·拉宾尼、乔·布莱克、桑迪·考法斯等等。这些名字深深嵌在了我的脑子里，60年过去了，我对这些传奇人物依然记忆犹新。

在我们住的街区，不知道球员的名字、击球平均数和投手的失败记录，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某一天与哪支球队比赛，在哪儿比赛，投手是谁，以及输了多少场比赛。我们也知道很多球员的私人信息，因为我们平时买的棒球卡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与道奇队的接触大多是通过广播以及比赛实况解说员里德·巴伯和文·斯古利，我们对他们都再熟悉不过了。

艾必斯野场（Ebbets Field）是道奇队的主场，我们家到那儿坐地铁需要半小时，我们每个赛季会抽几个周末去现场看比赛。一般都是买60美分的票，有时会买1.25美元的一垒线场边坐票。偶尔我们也会在球员通道入口处等着要签名。我至今仍记得一次杰克·罗宾逊走出球场是何等的疲惫。

道奇队带给我们欢乐和绝望。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孩子始终不愿回忆起1951年赛季末道奇队的失败，它输给了讨厌的纽约巨人队，没能获得13个胜场的领先，接着是季后赛，鲍比·汤姆森从罗夫·伯兰克手中击出的全垒打，震惊世界的一击。

1955年对道奇队来说是不错的赛季，最终道奇队击败洋基队赢得冠军。强尼·波德瑞斯是这场比赛的英雄。整个布鲁克林都一片狂欢。

道奇队深深影响了布鲁克林人们的种族观和社区意识。杰克·罗宾逊、唐·纽康伯以及罗伊·坎帕内拉都是非裔美国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我们并不是感伤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只希望道奇队能赢，当然球员们对我们来说如同家人一般。

当道奇队要转到洛杉矶去时，我们流传着一句俗语：现代史上最可恶的三个人——希特勒、斯大林和沃特·欧马利，事实上欧马利应该排在第一位。他是道奇队的老板，他决定将道奇队转移到洛杉矶，这对于我们整个区甚至整座城市来说打击巨大，留下了一个无法填补的黑洞。

坦白讲，作为一个不懂政治的青少年，我无法理解道奇队怎么能搬走。这支队是布鲁克林道奇队，就像布鲁克林大桥、布鲁克林大学以及整个布鲁克林区一样，是不能搬走的。你怎能剥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而且意义非凡的一部分呢？欧马利为了在西海岸攫取更大经济利润而把道奇队转移到洛杉矶的行为，让我最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我的童年经历也不仅是在布鲁克林街道上玩耍。

我一直记得在我13岁的夏天，父母把我送到了纽约州纳罗斯堡的十里河侦察营

(Ten Mile River Scout Camp)。这个夏令营性价比较高。那一年本该在夏令营待四周的，结果两周过后我就因为思家心切回家了。第二年我本该待两周，结果却待了四周，我在那儿还挺开心的。最后一次我待了六周，不得不回家时竟然还哭了。

我曾参加过幼年童子军，那时我妈妈是那里的女训导员，后来我又加入了356部队。部队偶尔会远足、野营，但这跟夏令营完全不同。

童军营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经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融入户外乡村生活：住在没有大门的小茅屋里，垫着草垫子在睡袋里睡觉，远足，露营，第一次观赏繁星点点的夜空，了解印第安传统，在湖里游泳，划独木舟，在大食堂里吃大锅饭，唱民歌。

一天，我舍友和我坐在床上看笑话书。一条大黑蛇从床的上铺缓慢爬到我朋友那边，蛇伸着脑袋逐渐靠近朋友的肩膀，我们两个立刻像看见鬼一般疯跑。

这对于一个从布鲁克林来的男孩来说的确是个难得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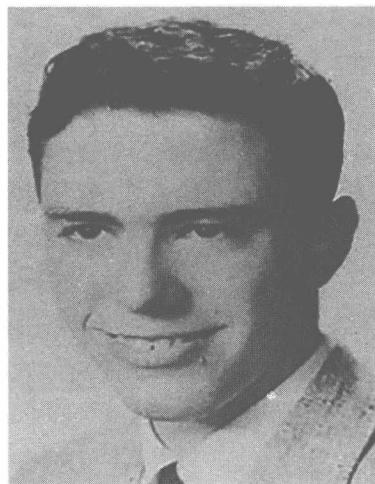
童军营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很喜欢住在乡村，如果我没去童军营，很有可能就在乡村色彩最浓的佛蒙特州度过一生了。

我的高中是在詹姆斯·麦迪逊高中念的，我的高中可不像小学那么有趣了。在PS 197小学，我几乎认识学校里的每个人，然而詹姆斯·麦迪逊高中要大得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新面孔。我高中算是个好学生，但谈不上出类拔萃。相比数学和科学，我对社会研究更感兴趣。

我参加竞选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我还记得我和妈妈在卧室走来走去琢磨怎么写竞选演说辞。我竞选主要思想就是呼吁学校收养一个韩国战争遗孤。竞选输了，但获胜者最终同意了我的理念：学校“收养”了那个孩子。

青年时最令我失落的一件事就是没能进入詹姆斯·麦迪逊高中的篮球队，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队伍之一，一直由传奇教练杰米·莫斯克维茨执教。

大学第一年，我成功入选了校队后备队，当时我激动不已。我的球衣很漂亮，是10号，回到家甚至都穿着它睡觉。但之后我被深深打击了。赛季训练之初，教练告诉我我被裁掉了，后备队被取消了，以后也不会有了，我漂亮的球衣也没了。这是一



《詹姆斯·麦迪逊高中年鉴》刊登的我的照片（《詹姆斯·麦迪逊高中年鉴》）



高中田径比赛（路易·霍华德 / 《詹姆斯·麦迪逊中学报》）

次沉重的打击。

我记不清具体原因了。后来我加入了田径越野队。当时我还小，耐力不错，能坚持一直跑。田径越野不像篮球那么酷，场边也没那么多观众，没那么受关注。但这个经历意义非凡，我喜欢而且擅长田径运动。

越野赛是从布鲁克林到布朗区的范特克兰公园，地铁都要走很久。上百位参赛者站在起跑线上，枪声一响，大家迅速冲往树林狂跑起来，全程共2.5英里。跑步时深呼吸，可以闻到落叶的气息。到了冲刺阶段的直线跑道，我超越了一个个比我要疲惫的参赛者。这段经历我永生难忘。

我很擅长于跑步，不仅是越野赛，短跑比赛我也擅长。1英里我用时4分37秒，这一成绩也令我赢得了纽约室内1英里锦标赛的第三名。我也获得过一些本区和本地比赛的冠军头衔。田径越野对我一生都很重要。努力训练，累得不行也要拼命坚持，这些自律的习惯让我受益终身。

芝加哥

半夜十分我到了拉瓜迪亚机场。我那时19岁，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买了一张去芝加哥的最便宜的机票。我和父亲道了别，带着些许害怕和担忧，离开家去了芝加哥大学。

妈妈几个月前去世了。我想离开布鲁克林，离开上了一年的布鲁克林大学。我有个朋友在芝加哥大学，所以我申请了并且顺利通过了。显然，芝加哥大学二年级还有空余名额，即便我的学术成绩达不到这所学校的标准水平，但还是被录取了。飞机凌晨三点到了芝加哥中途机场，随后我便去了芝加哥南部的海德公园社区。

来到芝加哥大学令我大开眼界。我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不论好坏，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塑造了我的今天。但这段求学经历也充满艰辛。

我爸爸 16 岁时在波兰就已经退学了。他经历过大萧条，所以总是担心缺钱和维持生计。他更希望我能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妈妈是个家庭主妇，她在纽约上完高中就不继续念书了。我的很多朋友和邻居的家庭背景也大同小异。

在芝加哥大学，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是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或企业家。我觉得自己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而且我有很多事都不明白，有时我感到十分孤独。

虽然生活上很艰辛，但芝加哥大学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在这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历。我欣赏很多教授，但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课上的内容，而是课外的知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是全美国最顶尖的图书馆之一，很多时候我都是一头扎在“书海”里。

虽然我上课和考试前都没有怎么准备过，成绩也不突出，但我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我学习研究了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我也读到了有关美国历史和人们生活的少为人知的一面。我了解到美国并不一直都是“自由之地、勇敢之所”，我们国家历史上也并非没走过弯路。除此之外，我还读了不少人物传记。

学校的阅览室既宽敞又漂亮，我被里面无数的杂志和期刊所震撼。谁能知道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刊物？无论什么主题，无论全世界哪个地区出版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我总是打算到阅览室查查资料完成作业，但一来了就沉浸在某一本期刊中。我就是在阅览室接触到《国家》(The Nation)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进步》(The Progressive)杂志以及一些其他的进步刊物。我的政治观也是在这里发展的。

我也开始批判性地阅读。念高中时，如果想要证明某个观点是对的，我们经常说“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随着我学习的渐渐深入，我发现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报纸里讲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我不仅爱阅读，我还经常跑步。在芝大的第一年，我参加了田径越野队，而且表现还不错。芝大绝不是体育强校，但它的体育设施是我见过最好的。芝大有漂亮的室内和室外跑道，最令我惊讶的是，我每次把汗衫放在篮筐里，第二天就被洗干净而且叠得整整齐齐了。在田径队，我跑半英里用时 2 分钟，这也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了。

有趣的是，虽然我上了很多有趣的课，而且很多时候都埋在图书馆的书海中，但我在芝加哥却是从课外学到大部分知识——主要是通过我参加的不少组织和活动学

到的。大学期间，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学生和平联合会（Student Peace Union）以及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通过这些组织，我学会了以一个全新视角审视政治。不单单是我们需要抵制种族歧视、战争、贫穷以及其他社会弊病，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都是有因果效应的。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富裕、权力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普通大众如何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媒体是被大企业控制的。政治家是怎么选出来的？也是大企业利益在作祟。工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这会对谁有利？种族歧视只是荒唐的偏见吗，还是背后有什么经济利益驱动？是谁决定发动某场战争，谁又能从战争中获益？生活幸福真的就是赚得更多，消费得更多吗？

大学期间，我见到一些很伟大的人，包括积极呼吁民权、劳工权以及和平的社区活动家们。我在大学期间也迎来了我的第一次投票选举，我投给了议员里昂·迪斯派瑞斯，他是芝加哥市议会的独立议员，当时市长理查德·M·戴利领衔的民主党一直反对里昂议员。在这一次的竞选中，基于任免权的政治机器庞大程度可见一斑。这段时间我还在美国联合屠宰业工会（United Packinghouse Workers of America）做了兼职工作，工会的总部设在芝加哥。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芝加哥大学念书，那段时间也是全国民权运动盛行的时期。许多加入诸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这类组织的同龄人都被逮捕了，而且在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以及南方的州，学生因支持废除种族歧视、争取投票权被镇压得头破血流。我加入了种族平等大会，后来被选为副主席，我的同学布鲁·斯拉帕波特担任主席。



照片显示我在运动中极受关注（戴尼·莱恩 / 《芝加哥太阳时报》）